

公安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北省公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搞好文史工作，

为振兴公安服务。

谢作达
一九八二年八月

谢作达：中共公安县委书记

史為今用
教育人民

張遠海
丙午年

張遠海：政协公安县委员会主席

戴补天（1901—1903）

戴补天，原名戴贵舒。戴补天，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在1926年踏上革命征途时改的，这表示他是怀着改天换地的伟大抱负投身革命的。1930年，在武装斗争活动频繁的江陵郝穴街头，出现了很多标语，其中一条写着：“老子戴补天，住在街湖边，有人想捉我，除非是神仙！”这反映了戴补天在革命斗争中机智勇敢、刚毅果断，富有胆识。

戴补天是湘鄂西早期革命斗争的重要活动家，特别是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6年到1932年这短暂而又光辉的六年时间里，记录了他在武装斗争和经济工作方面所显示的卓越才能和取得的卓越成就。他历任公安县委武装委员、县委书记、鄂西农民银行行长，红二军团经济部经济处长，湘鄂西省农民银行行长，湘鄂西省财政部长等职，为革命卓著勋劳。他于1932年被当作“改组派”被错杀了，但他的英名永远铭刻在革命史册上和人民群众的心中。

（一）

少年倜傥，胸怀革命壮志

戴补天，1901年4月出生于公安县东大垸（现仁和乡）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戴方先有数十亩田，主要是自己耕种，农忙时请人帮工，生活比较富裕。

戴补天因是过嗣的独子，自幼就极受宠爱，五岁时入本族伯伯戴方宣的私塾读书。这位堂伯伯兼老师，是一位思想开

明、为人正直而又受人爱戴的农村知识分子，所以，他在启蒙时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捷，智力超出一般学生。他在十多年的私塾教育中，熟读了《诗》、《书》、《易》、《礼记》、《春秋》以及《论语》、《孟子》等古籍，文化素养很深，文章写得流畅，书法也刚劲有力。老师很欣赏这个才华横溢的、落脱不羁的少年。他们师生之间很契合（后来这位老师在戴补天影响之下，也参加了革命工作）。1924年秋，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荆南中学。他由一个封闭的乡角落来到省城，大大开阔了视野，很快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决心走救国救民的道路，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补天，要象神话传说中的女媧氏一样，改天换地。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即将北伐的消息在武汉传开了，各学校提前放了暑假。武汉各界特别是青年界沸腾起来了，戴补天在巨大的革命声浪中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和公安籍学生覃济川、涂美中、朱联元、马俊等一道，迅速赶回了家乡，希图在家乡发动斗争，迎接北伐军进军公安。戴补天这次回家，一改过去以书本为伴的生活习惯，经常与朱联元、胡方熙（宜昌省立三中公安籍学生）等人在一起，谈论国事，更不时到离家数里的热闹小镇涂郭巷去观察社会动态。这时，北伐军即将到来到公安的消息传到了涂郭巷，人们喜形于色，戴补天更是兴奋非常，谋划着采取什么具体行动迎接北伐军。他见涂郭巷驻有北洋军阀吴佩孚部一个连队，想到如何瓦解它，为北伐军扫除前进道路。当时封建军阀部队的官兵极端腐化，这个连队的长官为了捞钱，在街上公开设赌，吸引了不少有钱人的子弟到这里来赌博。戴补天也装成一个阔少混入赌场，很快地结交了一些丘八朋友，得以随便出入兵营。他和四个北方兵混得很熟了，知道

他们思乡心切，恰巧这时部队移防开拔，就抓住这个时机鼓动他们拖枪逃跑了。这个连发现有四个人带枪逃跑了，立即进行大搜查，终无所获。后来他们才怀疑到这是“戴家的一个麻子儿子（戴补天小时出天花，脸上留有麻点）搞的鬼”，马上派出一排人把戴补天家所在的村庄——戴家台团团围住。可戴补天已闻讯潜赴汉口了。敌连长气急败坏地烧了戴补天的家，并把他的父亲抓去。后来他家花去一千多斤皮花钱才把他父亲保出来。戴补天在这次策动北洋军阀吴佩孚部的这个连的士兵拖枪逃跑事件中，开始显示出了他的革命胆识。

戴补天离开家乡后，于1926年7月在武昌与胡方熙一道，由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师祖山竹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追求真理的美好愿望，随后，由党组织安排在省总工会搞收发工作。在这里，他有幸经常见到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和武汉办事处主任李立三等著名革命领导人，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1927年3月，他由省工会选送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原名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学习。在这儿，他不仅提高了政治水平，而且学到了不少军事知识。“七·一五”事变后，军事政治学校编入张发奎部教导团（团长叶剑英），他随军去广州。未几回汉，接受新的革命使命。

（二）

组建武装 剪除地方“三害”

1927年10月秋收暴动后，中共公安县委惨遭破坏，县委主要领导人胡竹铭、覃济川、刘煊等人牺牲。在这严重困难的时刻，戴补天肩负上级党交给的恢复和发展革命的使命，迎着腥风血雨，回到了被白色恐怖笼罩着的公安。在此以前，省总工会特派员胡方熙陪同汉口码头总工会委员长张计储已到了南五

洲，在东大垸、南五洲一带发展了五十多个共产党员，恢复和建立了十多个支部。戴补天认为迫切的任务是要发展革命武装，于是他精心挑选了一批青年组成了“暗杀队”（土劣称之为“暗杀党”），由他自认队长，活动在东大垸和南五洲一带。有人对他说：“这样做是要诛九族的。”但他却坦然一笑，还把他的叔叔戴方耀也组织到了这支队伍中。戴补天组建“暗杀队”的武装斗争活动，重振了公安革命斗争的士气。

这个“暗杀队”，上级非常重视。当时，中共湖北省委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公安“杀土劣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尤以七区为猛烈。第七区本无新式武装，仅由农民选出最勇敢的三十余人，组成暗杀队，每以土豪劣绅之手段回报。土劣则收买流氓为其工具，现已进行杀流氓之工作。”（注1）正如这个报告中所记载的，“暗杀队”初成立时只有三十多人，队员们白天在家生产，晚上秘密集中，按照事先选定的目标，镇压那些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和流氓土匪头子。

“暗杀队”成立不久，迅速处决了二十多个坏人。年底，他们一举除掉了东大垸的“三害”，引起了四乡的震动（注2）。“三害”就是七区清乡团团总樊纯香，保董朱洁成和恶霸段显义三人。樊纯香横行乡里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他霸占了农民邹福昌之妻后还不罢手，又杀死了邹福昌。至于朱洁成和段显义二人也是无恶不作。这三个家伙勾结在一起，经常借“清乡”为名，到处抓人，大肆敲诈勒索，群众恨之入骨。戴补天决心除“三害”。

1927年11月的一个夜晚，北风呼啸，乌云密布，轻装紧身的暗杀队员们个个身藏匕首或短刀，借助天气的掩护，分三路朝预定的三个目标扑去。朱洁成是戴补天的堂舅，行动前，队员们有所顾忌，戴补天严肃地说：“他虽是我的亲戚，

但他是大恶霸，不杀他何以服人！”暗杀队员按计划分别将朱、段两家包围，朱、段两人正在家里睡大觉，樊纯香则被“暗杀队”的内线稳在一家酒店里打麻将。半夜时分，戴补天带领部分队员，首先径奔朱洁成家，顿时朱家起火，戴补天乘机冲入朱的卧室，亲手将他这个堂舅处决了。另两处的队员们望见朱洁成家的火光，知道队长动了手，也就迅速动作，将樊纯香和段显义干净利索地干掉了。

“暗杀队”一夜之间除掉“三害”，土豪劣绅们既怕又恨，他们慌忙收买了一些流氓土匪与“暗杀队”作对。南五洲劣绅兰天作纠集了二十多名地痞流氓，开办了一个“武学”，日夜练武，并扬言：“杀尽暗杀党，活捉戴补天”。但这个狂言没放出几天，兰天作自己倒被“暗杀队”杀死。他尸体上贴了这么一张条子：“我辈暗杀党，布下天罗网，哪个敢作对，他就是下场。”武学里的一帮流氓地痞吓得如鸟兽散。一时间，“暗杀队”和“暗杀队”队长戴补天的名字传遍了四乡，反动派闻风丧胆，而四周老百姓则无不拍手称快。当时东大垸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黑夜一阵风，
土匪钻窟窿，
土劣更害怕，
逃得影无踪。
好个“暗杀队”，
穷人都敬佩，
不沾庄稼汉，
恶霸尽倒霉。

(三)

英勇战斗 予敌累累重创

1927年冬，段德昌受上级党组织派遣到公安担任县委书记，戴补天任县委武装委员。这时，“暗杀队”进行了整顿，并得到了发展，全队由三十余人扩充到九十余人，分成九个战斗小组。

1928年元月20日(农历丁卯年腊月二十八)下午，段德昌正按照湖北特委“普遍地发展农村暴动”的指示，在南五洲和戴补天一起研究“年关暴动”问题时，前来开会的胡方熙带来了一个意外情报：国民党七十三师某团的营长傅祖光部窜到了小市镇桥埠头。

傅祖光是长期在公安江陵两县边界骚扰的大土匪，有首民谣说：“土匪傅祖光，心毒似虎狼，借名逼枪款，地皮都刮光。”这回傅祖光刚被国民党收编，委任为营长，他便得意忘形地带着百余人，七、八十支枪来清剿“暗杀队”。

根据这一情报，段德昌、戴补天、胡方熙决定利用天时地利等有利条件，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消灭傅祖光，于是连夜召集暗杀队员开会，规定每人除备好常用的大刀、梭镖外，还要带三枚特制的酒瓶手榴弹，并布置附近各党支部带领农协积极分子配合行动，每人还带三个大爆竹。

农历腊月三十，九十余名暗杀队员和一百二十余名农协积极分子顾不得吃团年饭，掩藏好随身武器，三三两两向桥埠头汇集，傍晚时已陆续隐蔽在傅部营房四周的老百姓家里。

夜幕降临后，四处群众家里吃团年饭时响起烧香祭祖的鞭炮声，敌人营房里灯影憧憧，这时有三人直向营房走去，前面是戴补天，中间是胡方熙，他们身上藏着匕首，手里提着酒

肉。后面段德昌，装扮成挑夫，挑着装着乱七八糟的东西的箩筐，看上去象是一满担礼物，他肩上的“扁担”是用黑布裹着的一条步枪，仅把枪栓和扳机露在外面，黑暗中很难看出破绽。

这时，傅部营房里“团年饭”刚刚散席，整个营房酒气熏天，烟雾弥漫，灯光昏暗，喝醉了酒的士兵七歪八倒地挺在铺上，没醉的在打牌赌博，傅祖光本人也醉熏熏地和手下几个头目在玩牌。

段德昌、戴补天、胡方熙三人走到傅部营房门前，两个站岗的哨兵还打着酒呃，戴补天上前招呼说：“烦兄弟进去禀告一声傅营长，说涂郭巷的三爹（即傅祖光的堂兄，涂郭巷商会会长傅祖清）派人送年货来了。”哨兵见他们提着酒肉，挑着满担礼物，深信不疑。其中一个刚走进通报，戴补天和胡方熙就猛扑上前，卡住另一个哨兵的脖子，下了他的枪，绑在一边。他们然后悄悄地摸进了营房。

正在玩牌的傅祖光，听说堂兄送年货来，高兴得连忙起身迎接。他刚走到二堂门口，迎面而来的段德昌迅速端起枪，“砰”的一声响，傅祖光象死猪栽倒地上。

听到枪响，埋伏在四周的暗杀队员和农协积极分子同时从不同方向冲出来，呐喊着朝营房扑去，并纷纷扔出“手榴弹”，燃放大爆竹，刹那间，喊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震天动地。沉醉在梦乡里和赌场上的敌兵们遭到这突然袭击，惊得魂飞魄散，从地铺上和牌桌上蹿起，四散逃命。傅祖光的司书还想顽抗，被段德昌当场击毙。不到半个小时，傅祖光部全部瓦解。年关暴动，首战告捷，大获全胜，缴获长枪六十余支，短枪十一支，我方无一损失。

消灭傅祖光后，公安群众到处传唱一首歌谣：“杀了傅祖光，民众都欢畅，多亏共产党，为民除虎狼。”敢死队员们的

士气更为高涨了。

傅祖光部被歼不多日，县委接到陈祠桥农民自卫队领导人杨荣祥的信，说闸口清乡团防备空虚，是夺取武器的好机会。段德昌、戴补天等立即决定趁这大好时机歼灭敌人。几天后的一个细雨蒙蒙的夜里，戴补天带着暗杀队员到他的堂弟戴金舒家集中出发，大家不顾泥泞路滑，连夜走了二十多里路赶到闸口，在内线的配合下，未响一枪就解决了清乡团的武装，缴获长短枪三十二支。此时，“暗杀队”从无到有，聚集到了一百多支枪。据此，县委将“暗杀队”正式改名为赤卫队。

傅祖光部被歼和闸口清乡团被袭击，使公安县反动政府恼羞成怒，他们于1928年3月调集了六、七、八区的三个区团防组成的清乡团共一百七十来人，分三路包围赤卫队驻地——东大垸沙包，妄图一举歼灭赤卫队。段德昌、戴补天得知这一情况，在敌人出动前，开会研究，紧急部署，将赤卫队分成三路，悄悄地埋伏起来，其中两路分别埋伏在晋埠头、涂郭巷，段德昌和戴补天则带一路埋伏在离沙包不远的东堤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们把这一带的青壮年和妇女、儿童事前转移了。一天上午，三路敌人倚仗着人多枪多，大摇大摆地向东大垸沙包杀来。等敌人刚刚过去，三路赤卫队就分别尾随在他们后面。敌人到达东大垸沙包后，挨家挨户搜查，不仅没见到赤卫队的影子，就连一个青壮年和妇女、小孩也看不到，只好抓了十几位老人来审问，另在墙壁上刷了不少“消灭共产党，活捉戴补天！”“活捉戴补天，赏洋两千元”的标语。敌人折腾了半天，最后拖出了一个叫戴还生的老人，逼他交出戴补天，将他活活整死，还放火烧了十多家老百姓的房子。正当敌人疲惫不堪就地休息时，三路赤卫队员向包围圈里的敌人发动了猛烈进攻，霎时枪声四起，赤卫队从地下冒出，敌人乱作一团，

狼狈逃窜，丢下了十几具尸体和八十余支长短枪。这样，三个区的团防“清剿”我赤卫队的野心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早在1928年2月初，在公安县委的领导下，段德昌、戴补天改造了带有迷信色彩的群众性佛门组织——“硬头会”。这个组织的活动大都是反对官匪和土劣的，大部分成员是贫苦农民。它从江北沈家洲发展到江南金猫口、观音寺一带，并设有多处会堂，斗打时，不用枪，不用刀，先喝一碗“佛水”，然后打着赤膊冲打，相当勇敢；如果捉到对手，不用刀杀，只用头将对手撞死。因此，它的成员个个头上都练出了一块硬硬的疤，“硬头会”也就由此而得名。它出现不久，段德昌、戴补天就派遣共产党员廖大俊、高尧臣担任它的坛主，成了我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在这一带杀土匪，除恶霸，闹得热火朝天。

为了对付日益高涨的六、七区农民运动，县反动政府于四月初调集县警备大队和全县八个区团防，准备对六、七区进行大“清剿”。六区副团总马诗甲带领县警备大队，还有四、六区团防，先期到达闸口。这一情报，县委掌握后，段德昌和戴补天研究决定，趁敌立足未稳和其它区团防尚未会合之际，抢先动手，使其措手不及，一举而消灭之，并决定由戴补天、邹资生、李金生三部执行这一任务。

4月7日，我方向闸口之敌发动了进攻，担任主攻的是拥有两百多人的“硬头会”，他们这天清晨突然出现在闸口。这时，闸口的敌人刚起床，睡眼惺忪地突然见到这一大批打着赤膊、挥着大刀的队伍向他们扑来，魂都吓掉了，纷纷逃到河边的工事里。有的敌兵吓得枪都不敢放了，慌忙找了一些大粪朝“硬头会”队伍里乱泼（一般传说大粪是可以“破佛”的）。这时，戴补天、邹资生率部又从吴达河冲过来，敌人遭到两面夹击，只好往朱家咀方向逃窜，打算再从朱家咀渡河逃往县城。

李金生部早就等在他们必经的谢恩桥边，给了他们个迎头痛击，打死了不少敌人。敌人在不同的地区连遭赤卫队的几次袭击，被迫向白湖里钻，这正好进了我方预定的伏击圈。埋伏在白湖的农民梭镖队，这时蜂拥而出，有的操着锋利的梭镖，有的手持大板铁锹，杀向这些残兵败将，我方追兵又源源赶到，马诗甲被当场杀死，除六区团总刘文清等几人脱逃外，误入白湖击伏圈的敌人全部被歼。全县反动派大为震惊，其它几个正在集结的区团防闻讯，都慌忙回营。敌人的“围剿”计划又一次被我赤卫队粉碎了。

1928年4月，鄂西特委在公安召开了代表大会，段德昌、戴补天等出席了会议。大会决定，将本区的武装（以公安军事力量为主）改名为鄂西赤卫大队，转移到江北石首桃花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段德昌率公安部分武装转移到石首、监利一带，戴补天与孟伯平、孟昭学等人率部分武装到江北沈家洲一带继续坚持斗争。

与斗湖堤一江之隔的沈家洲，当时是公安范围，由于它单独地撇在江北，公安县政府很少管到这里，再加上宽阔的江面阻隔，公安的反动军队也不易过江清剿。因此，戴补天选择这里作为新的活动区。共产党员高尧臣、廖大俊早就在这里发展了党组织，加上这里距江陵县革命活动的中心沙岗较近，群众基础好，更为戴补天转战江北创造了打开新局面的条件。

为了活动方便，戴补天开始以“游学佬”的身份，在沈家洲走村串户，继而以在沈大春家做女婿为名定居下来。沈大春是一位忠厚本份、挖草药为生的农民，家有三间茅房，单门独户，周围是一大片毛竹林子，比较僻静，是一个理想的交通站、联络点，很适合开展秘密活动。戴补天在这里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后，经常在张黄场秘密张贴标语、传单，发展组织，

先后发展了十多人入党。经过戴补天和同志们一年多的努力，这儿终于开辟了上至观音寺，下至马家寨沙岗的一块纵横约三十里的赤色区域。1929年10月16日，戴补天和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沈汝成、高尧臣等在黄家场召开了隆重的江陵县沙南区苏维埃成立大会（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组织也同时组成），在会上镇压了当地土豪沈大松等三人。这次大会不久，沙南区所属各乡亦纷纷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一是加强了武装力量，提高了防范敌人的自卫能力；二是经常开展革命宣传，进一步发动了群众；三是没收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至此，掀起了这一地区土地革命的高潮。

沙南区、乡苏维埃建立后，戴补天曾带领农民武装三打观音寺，扩大了革命声威。观音寺位于沙南这块赤区的北部边沿，紧靠长江，距沙市不远，任子宽的清乡团长期驻扎在这里，严重威胁着沙南红色政权的安全。为了保障这块赤区的存在和发展，戴补天和沙南区委决心打掉这个反动堡垒。

第一次攻打观音寺是1930年1月31日（庚午年正月初一）。在马家寨召开了万人大会后，队伍分成两队，一路走长江大堤，一路走垌里，队伍一边走，一边高呼“打倒土豪劣绅！”“苏维埃政权万岁！”的口号，斗志昂扬，迅猛地包围了观音寺。但由于枪支过少（只戴补天、沈汝成、高尧臣三人有手枪），敌人又有戒备，未能攻克，反而死伤几十人。

第二次攻打观音寺是2月10日（正月十日）。这一次戴补天吸取了前次的教训，经过周密准备，首先从各赤卫队中挑选四十多名彪悍的青年组成了敢死队，又从监利游击队调来了三十多个有实战经验的战士，个个荷枪实弹。所以这次很顺利地把观音寺攻下了，并缴获了十多支枪，但任子宽跑了。沙市国民党驻军应任子宽请求赶来增援，我方才退出了观音寺。

第三次攻打观音寺是4月10日（农历三月十二日）。沙南区游击队、少先队在监利游击队的有力支援下，攻克了观音寺，把任子宽赶到了赤区外二十多里的窑湾。

三次攻打观音寺，使刚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沙南区的游击队此时已发展成为拥有一百六十余人，一百多支枪的武装力量了。

（四）

放下枪杆 改抓经济工作

1930年春夏间，由于鄂西党的“二大”精神的传达和贯彻，洪湖地区革命斗争形势大好，江（江陵）、石（石首）、监（监利）、沔（沔阳）、潜（潜江）五县均组成了县苏维埃政府或县苏维埃政府筹委会。建立县苏维埃政权，对统一指导苏区工作，是非常必要的。4月中旬，鄂西特委在石首调弦皇陵庙召开了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等五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戴补天被选为主席团执行主席之一。这次会议，总结了各县工作，讨论了巩固和扩大赤色区域的问题，成立了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并设立了土地、财贸等机构，委派戴补天任“鄂西农民银行”行长（注3）。

鄂西农民银行设在调弦口，联县政府明确规定，银行在联县政府监督和保护下，“建立单独系统”，“负责发行货币，调剂赤色区域金融，办理农民储蓄借贷”，“下级银行绝对受上级银行的支配”。（苏区各县均设立了支行，有条件的区、乡设汇兑所）

为了统一苏区金融，联县政府还规定：禁止各地银行滥发货币，各县已发出的各种纸币，一律设法收回，统一使用鄂西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此，在戴补天领导下，鄂西农民银行在石首冯家潭子创办了“制币厂”。

制币厂有工人三十余人，还派有十余名手枪队员负责保卫

工作。制币厂有石印机十多台和十块石印钞票板，用石印印制纸币。鄂西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有一元、二元、一角、二角四种，各种票面上方印有“鄂西农民银行”字样，中间标明钱数，背面上方印有“活动赤区金融完成地方暴动”字样，各种票面均有不同的花纹。鄂西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最初在五个县通用，后来流通到了湘鄂西各地区。为了取信于民，鄂西农民银行规定，纸币可直接兑换银洋，并以土地税和商业税作保证，从而提高了纸币的信誉，为湘鄂西苏区的金融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鄂西农民银行通过发行货币和开展信贷业务，统一货币制度，集中现金，流通金融，对于促进工农业生产和贸易的发展，粉碎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巩固和发展苏区经济基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戴补天由一个军事指挥员转行为一个干练的经济工作领导人，要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主要的要学习研究许多新的东西，这种服从革命需要，干一行爱一行并取得成功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五)

组织群众 迎接红军会师

1930年5月间，为了迎接红四、六军在公安会师，鄂西特委派戴补天回公安担任县委书记。这时，恰逢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中原之战”，蒋介石已将湘鄂地区的主力部队调走，只留下装备窳劣、战斗力不强的杂牌军和地方团防武装，敌人守备十分空虚，给革命运动的大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戴补天回县后，首先建立秘密农民协会，会师前夕，全县乡农民协会已发展到四十多个，乡农民协会实质上是乡级苏维埃的雏型。同时，发动在长江两岸的沈家洲、窑头埠、斗湖堤、涂郭巷、向家湾一带的党组织积极做好

支援红四、六军会师公安的准备工作，诸如部队住房、粮秣供给和渡江船只等。7月初，全县已有一些地方公开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7月4日，红四军、红六军在公安县城南平胜利会师。戴补天闻讯，带领游击队袭击了驻斗湖堤的敌保安中队，歼敌十余人，缴枪十余支，占领了斗湖堤，并于7月7日在斗湖堤成立了公安县革命委员会，他兼任主席，同时成立了工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和儿童团等革命组织。斗湖堤是一个临江的集镇（现是公安县城），是公安的东大门，红四、六军会师东下洪湖，选择这里作渡江的主要渡口。戴补天将县委会设在这里，是便于领导沿江群众迎接和支援红军。为了造成一个迎接红军、支援红军的浩大声势，戴补天在斗湖堤召开了一次有各地农协代表参加的千人大会。会上，镇压了大土豪劣绅和大烟土犯七人。戴补天在会上讲话，号召城乡人民迅速动员起来，打击土豪劣绅，公开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筹集军饷，用实际行动迎接和支援红军。会议气氛十分热烈。这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公安第一次召开这样隆重的革命大会。会后，全县相继有四个区、十八个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形成了公安革命运动的高潮。

7月11日，红军第二军团总指挥贺龙率部来到了斗湖堤，戴补天组织群众热烈欢迎，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欢迎标语，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摆着茶水，较宽敞的屋里还准备了饭菜。段德昌所部六军吃过午饭后首先渡江。晚上，贺龙同志亲切接见了公安县委和革委会的全体成员，听取了戴补天关于全县和沿江两岸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对公安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第二天上午，因有敌舰袭击，戴补天陪同贺龙同志转移到斗湖堤上游二里许的窑头埠住宿，第二天早晨，又陪同贺龙同志从窑头埠过江。